

作进攻部署,其余部队各有固守碉堡的任务,抽调部队增援有问题。其次,第四军非蒋介石嫡系部队,正是蒋借刀杀人的好机会,何况五都是四面环山的一块盆地,红军一旦冲入,四军官兵势必走投无路,束手待缚。

五都之役,不过是小规模的争夺战,但当时蒋介石的宣传机器大肆渲染,说成:取得辉煌战果,击溃红军的主力。这和当时的事实对照起来,多么可笑啊!记得当红军撤退后,有人主张出击,但欧震、韩汉英等人均不赞成,恐遭红军暗算。从这一点看来,可见当日第四军将领心惊胆战,不敢越雷池一步了。

在战斗进行中,肖文频频请援,欧震极表不满,认为:“肖文平日高谈阔论,战时束手无策。”当时欧震曾向五三五团的营长李标询问战况,李答:“请师长放心,有李标在,红军无法占领五都的”。他高兴地对参谋长黄占春说:“像李标这样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啊,我平日原谅这班老粗,就是因为能安慰我”。喜爱行伍出身的军官,也是第四军将领的特点。

参加西南反蒋活动忆述

陈庆云*

1936年,因西南树起反蒋旗帜,以胡汉民、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等及西南诸要人,组成了“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任西南第一、二集团军总司令长官,与蒋介石分庭对抗。时曾拟派一部军队入闽号召倒蒋之役。入闽军事长官一职由吕渭生和陈维远等争夺。本人曾参与其中周旋,深知一些情况,现就所记忆述于下。

一、赴粤经过

先从吕渭生谈起。吕系西南政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福建南安县诗山人,父兄均在菲律宾经商。其兄吕文合颇有资财。吕在上海暨南大学政治系毕业,自少年加入孙中山组织之同盟会,结交胡汉民、萧佛成等前辈革命党人。1926年随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入闽,打垮北军周荫人、张毅。至1927年全闽局势安定后,民军进行点验收编中,吕任新编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新编军被十一军打败解体后,吕又跑到菲律宾,直至1933年从香港回广州投靠胡汉民、萧佛成,参加在粤组织反蒋活动。1935年对入闽军事长官人选问题在萧佛成极力支持下与陈维远力争。斯时我赋闲于厦门鼓浪屿,接到吕寄来一信,主要内容是介绍西南政务委员会拟派一部分军事力量入闽号召倒蒋之役,对军事长官人选未定,要我组织一些人充当福建军事代表赴粤,向西南政务委员会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长官陈济棠请愿,要求选派吕带军入闽。最后加重语

* 作者当时系西南反蒋活动见证人。

气交代云“时机已至,请速来粤面商要事,如能多邀几位代表更妙,切勿延误”等(我与吕系为旧交好友,因当时本人带所部驻南安诗山吕的家乡,结识为好友)。吕同时亦写信给张静山、吴鹏等人。张静山原为汪连团长的副官长,算是我的部属,吴鹏和我素不相识,原为汪柴水(东路讨贼军团长)的部属。经张的介绍后一起赴粤。

二、穗港活动

1. 会见萧佛成、陈济棠的经过情况

我们三人于8月某日,由厦门乘太古轮至香港转九龙搭广九铁路的火车直达广州。随即往马棚岗吕渭生私寓。吕看到我们已到甚为感激,以礼相待。在吕家中片刻,随由吕亲自引见萧佛成于梅花村萧的别墅。我们向萧表示来粤的动机后,萧点头口称甚妙!甚妙!遂即挂电话给总司令部陈济棠,言及“现有福建军事代表陈、张、吴等要求晋见,商讨有关入闽反蒋计划及选派入闽军事长官之人才等,希予接见”等话。然后又以恳切的态度面嘱我们三人,如见陈济棠须坚执请派吕渭生为入闽军事长官,有什么情况再来见我协商。

我等辞回旅社后,越日果有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唐灏青乘司令部汽车至旅社访我们,言“奉陈总司令之命,约我等于星期天到梅花村陈的别墅会见”。届时唐又亲到旅社来接我们。我等随即同车前往。在途中唐曾问及“你们求见陈总司令是否为请派吕先生为入闽军事长官而来?”我们答“正为此事而来”。唐接着又说:“吕先生非军事人才!陈总司令已内定前在沪抗日之十九路军旅长陈维远,此人现在粤赋闲无事,李总司令(即李宗仁)也同意了,我看你们也不必反对为妙!”我们当时并无表示任何态度,心想待见到陈总司令再作计议。汽车驶进梅花村至陈的别墅停下来。

陈在楼下会客室接见我们,唐灏青也在座。先由唐逐个把我

们介绍后,陈就先问起十九路军在闽为什么会被蒋介石消灭?我答:“当时十九路军官兵确实勇猛善战,但蒋介石兴师动众,用十多师兵力,先由五十六师刘和鼎和三十六师宋希濂以及李默庵全师等进攻驻延平之十九路军司徒菲旅,双方激战,三十六师李良荣旅损失惨重。由于寡不敌众,司徒菲旅终于被攻下来。蒋又令卫立煌、李延年、李玉堂、李琴玉等师由福州、厦门等地围攻驻泉州之毛维寿师”。张静山接下说:“毛维寿仅以朱辉一团之众在惠安就与蒋一个师之兵力抗拒,蒋军虽多数倍的兵力,一时也难攻下”。吴鹏插述:“当时主要是蒋鼎文在沪起用杜起云出任福建特派军事专员,杜与蒋鼎文之便衣队潜入厦门,由杜暗中联络在厦之台湾浪人十八大哥、东南旅社谢卫发、李良溪、陈龙江等出为协助,把蒋鼎文全师由沪及在福州李延年、李玉堂二师用大轮船载运至厦门登陆,后蒋鼎文又利用龙溪、海汀之黄和东等股匪捣乱漳码治安,然后发兵进攻驻漳码之十九路军区寿年师。李玉堂全师即由同安县开进安溪县,下南安溪仔尾包抄驻泉州之毛维寿师。毛维寿师在四面受围的情势下不得不妥洽投诚。至此,十九路军全部被消灭了。”

陈听后接着又问及:“蒋介石现在福建兵力有多少?”我答说:“以现在自闽北至福州有刘和鼎之五十六师,宋希濂之三十六师。泉州有李延年第九师,漳州有蒋鼎文全部。蒋鼎文兼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设绥靖公署于漳州”。陈说“据此方所得情报,泉州第九师李延年兼泉永绥靖区司令与蒋鼎文意见矛盾。李有不服蒋的指挥之慨,而蒋常在厦门嫖赌,被李延年暗中上报攻击等,有否此实情”?我答曰:“有此事实,因李延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受蒋介石重用,入闽后不服绥靖主任的指挥,蒋主任心怀不满,适李之团长袁敬(李的表兄),因营长单达驻晋江石狮纵兵扰侨,激起群愤,被当地华侨聚众告发至漳州绥署。蒋认为报复时期已到,应照公严办,随即将袁敬、单达二人逮捕,上报中央批准后就地执行枪决。因此,双方矛盾重重”。陈济棠说:“准备要派一支军队入闽,开展反

蒋活动,经研究拟派陈维远为入闽军事长官,诸君意见如何?”我们三人见唐灏青在暗中指示赞同陈维远,结果我们亦不反对,也不赞成,只是提及吕渭生先生之名而已。但陈济棠态度不以为然,并说此人非军事人才,岂能负此重任?他说:“明天我有要事未能奉陪,我已嘱唐处长及副官主任在太白酒楼备宴为你们洗尘。”接着就辞客了,我等也就辞回旅社。

2. 赴港晋谒胡汉民

我们三人被受宴后,把经过情况告知吕、萧二人。时萧佛成为震怒说:“那陈维远是与唐灏青同在保定军官学校同学的,又是福州同乡,听到入闽活动费有十万元,可以先领取五万元。此辈人视钱如命,此皆为唐之意见推荐于陈济棠。我偏不赞成,照我观察,若只我单独与之争执是无成效的,以我之见还是请胡汉民先生提意见,来荐任吕先生。”他又说:“至于李宗仁是没有问题的。惟有你们须于明天往港一趟,请胡先生来电给陈济棠止委陈维远的荐任,请即致荐吕渭生。最后又嘱咐说,我可另行修函给他。你们至港后先到中兴报社找编辑黄禄藻先生,请他先行疏通胡先生,约定时间接见,你们方能便利。”

我们三人受命赴港后,按萧的指示找到黄禄藻先生,献上肖的手谕,并说明来意。次日下午即由黄引我等至铜锣湾胡私寓铁门外,门外有香港当局派的两名印度兵守卫,入门至月台楼下又有广东宪兵守卫,二楼、三楼均有胡的护兵手执驳壳枪、左轮枪把守……越过重重森严的警卫线,然后把我们的名片传至四楼交与胡的女儿胡木兰。后由她引上五楼方始得见。胡接见我们礼待甚殷,他说:“福建的同志余只认识一个吕渭生先生,今天你们来了很好。”接着他又说:“我已接到萧佛成先生来函,要我荐吕渭生为入闽军事长官一节。我想如荐他统兵,恐难保陈伯南(即陈济棠)之同意,因为吕先生非属军事人才,他是文人,有政治学识,我是了解的,早年在菲律宾我们就结为好友,岂有不赞成之理!不过余的意

见,提荐一位最有军事常识又与福建有历史上关系的许汝为(即许崇智)来充任此职,谅你们福建诸同志亦能赞成吧!余不怕陈伯南不赞成的,你等可把我的意见转复萧、吕二位同志,另余也修函给他们,如无异议你们可自派一人来港携带我的书信往沪,请许来粤见余。”

紧接着胡就转询我等,他问:“蒋介石动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攻打十九路军,才把他消灭吗?”我等答述如旧。谈话中间其女儿胡木兰即插话说:“遵医嘱咐,贵客未便多谈。”言下之意因胡是养病在家不宜多谈,以此辞客。胡汉民当即解释说:“今日福建同志远道而来,多谈一刻无妨。”我们知其来意随即告辞出来。当晚乘广九火车回粤。

3. 吴鹏到沪会晤许崇智的情况

我们回到广州后,随把胡之意见转告萧、吕二人。他们听后均同意这个意见,随后我等推举一人赴沪。我乃举吴鹏前往。一星期后吴由沪回粤,言及面谒许崇智的情况。他说:“许见胡的手谕后,先表示感谢,后坚持不愿出山,且云蒋介石曾九次请他出任军事要职,他都坚决辞绝,表示已过惯赋闲生活”等,同时也表示,当致函胡汉民及萧、吕二先生以表谢忱。

当吴赴沪期间,我与张静山在广州等候消息时受到王懋(福州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原随方声涛入闽任参谋之职,与我相识。当时在粤其岳父沈演公即前清沈葆楨的曾孙在家中赋闲,因与唐灏青同学,受唐之命暗中在做我们的工作)的注意。某日王亲到旅社约我等到沈的“演园”吃便宴。王在宴餐中谈起入闽军事长官人选问题。他说:“这次听说你等至粤意欲请吕渭生先生为入闽军事长官,据余了解,陈总司令已内定陈维远先生,我看此人比较适合,吕先生是文人,如果喜欢回福建,我看事成后不怕没有厅长可当!”当时我只和他应付几句,并没有表示态度。直至吴鹏回粤后对此始感到未能如愿以偿,欲望将成泡影,赴粤的活动也就至此暂告一

段落。

三、返闽后的动态

1. 回闽后的反蒋活动

受萧、吕二位的嘱咐,于9月下旬返闽。随后张、吴二人随即暗中派人往惠安活动,准备纠集旧部。我也回同安家乡诗板乡,派遣陈常生等人到南安、安溪等处联络所有旧部,待机进行活动。直至翌年元月间,接粤吕渭生来函,言及蒋介石现已派员与胡汉民先生及西南诸要人进行和谈,关于入闽之事暂时停止等。至此我们的反蒋活动也就暂时搁浅下来。

惟当时我们三人赴粤的活动真是同床异梦!盖吴鹏者,乃是受侵华日军山岛大尉及土肥原司令的指使从事收集情报、出卖祖国的大汉奸,张静山乃是厦门军统的间谍,但我却蒙在鼓里,未知他俩所搞的勾当。适临回厦前夕,吴、张二人外出,时吴鹏的好友林森木(台湾人,在我们抵粤的第二天他也在粤,同宿于旅社)对我密谈,他说:“此次若回厦门,你和我及老吴一齐到台湾去是个好机会,山岛大尉对吴先生非常重用,现在厦等候,吴一回即要同往台湾向土肥原回报,同时准备邀高义同往台湾。你如能与我们同往台湾,定有好处。山岛大尉已知道你是高义的旅长,能掌军机事务。”最后他自我表白,把自己的身份、任务等暴露给我,他说:“我是日本领事馆的职员,这次受山岛之命特地来粤的”等。听了林森木的这段话始知吴至粤的勾当。我当时对林森木答说:“搞这种勾当未必有当,我们待回厦后再行商谈吧!”当时我心虽明白决不能去做败坏民族出卖国家的汉奸,不取吴之所为,但又认为如果高义愿同往台湾,我何为不可呢?因此,抱定观望高之行动,把自己命运托付高之所为而定。

2. 会见高义

迨我等三人回厦后,吴鹏即会见山岛于鼓浪屿日本盐田旅社。

次日吴、张二人又来邀我同往高义私寓探望。我虽知吴此行之用意,但伪装不知,心里有自打算。至高寓后,高热情招待我们,吴即先述及我等三人此行赴粤反蒋活动情况,因失败抱憾而归的经过。高听后表示关切。接着吴就提说:“日本武官山岛大尉托付我等,言及意欲邀请高师长同往台湾见土肥原司令,未知你的意见如何?”高义听后随即坚决拒绝,并说:“日本鬼子欲以吾中国人为豕,吾人必须以日本人作狗。”其语激动,吴随作罢论,辞别而出。越日我又单独往见高义。高即对我斥问:“你等亦敢来诱惑我往台湾?”他说:“日本山岛大尉早已运用台湾人柯阔嘴等人来游说我,已被我拒绝之,我们必须明白,他是要侵略我中华,想利用我等大小汉奸去做他们的走狗。”并嘱说:“你与静山是我的旧人,要告诉静山,吴鹏此人是不可靠的,不可与他为友。”我当即向他解释并无此意,这次赴粤是受吕渭生的委托,为尽友情而行的。高说:“反蒋活动是可以的,这个人(指蒋介石)惯用排除异己的手段,如蒋鼎文和李延年的矛盾,李不服蒋鼎文的指挥,就是靠他是黄埔毕业,得蒋介石偏宠,致杜起云无辜被杀,真可恶”。聆悟高的劝语,我更坚定了决心,自思幸不受林森木之诱惑。

3. 吴鹏投敌卖国参加特务组织的情况和下场

日本武官山岛大尉自 1934 年来厦门后,即通过东南旅社谢亚发及日籍台湾人李良溪、陈龙江的关系,发展其特务组织。先后接收龙溪、海汀之黄和东、陈名扬、陈松茂及惠安吴鹏等参加,其中吴为山岛最得力的走狗,而吴也积极为其服务。

1936 年 2 月间,我们知悉粤军已无人闽希望,又悉厦门警察局长沈覲康已侦悉我等三人曾赴粤进行反蒋活动,布置要拿我们的消息。当时吴鹏已接到日本领事馆的通知,叫他暂时匿宿于日本洋行东南旅社及李良溪私寓,后又移匿于鼓浪屿日本人的盐田旅社。至同年 5 月,吴知道我和静山同样匿宿在法籍黄仲训(南安巨商,时我等住在其瞰青别墅的花园,因该园的工头黄培系张的同

乡好友)处,也就改迁移来和我们在一起(有同病相怜之慨,且不要多费钱,地方又理想)。直至7月间某日,陈秋澄(原为我的补充营营长,离职在厦经商)突来访我,对我言及:“你还睡在鼓里,张静山已是军统南站连谋(字良顺)的人,你是不成问题的,惟可惜吴鹏投敌做汉奸,性命极为危险。”这使我更觉得三人实为同床异梦。接下陈秋澄又说:“吴如肯回头尚可挽救”。我乃将陈所述之言转告吴鹏。并劝他何不转回祖国怀抱,做反间谍工作,将来岂不光荣?又可保性命安全。吴听后感慨地说:“虽有心转向,但无门路可入。”事隔一星期,陈秋澄又来访我。我随即把吴鹏的意见转告于他。陈答说:如有决心就有办法,现在与福州宪兵团团长吴天放(即戴笠亲信)接洽定能成功,因吴天放团长同是惠安人,又是好友。我立即向吴鹏说妥,吴鹏取出50元送秋澄作旅费求他赴榕游说。陈秋澄系连谋之好友,经常来往,所以深知其详。一个星期后陈回复吴鹏说事已办妥,现吴天放团长已将情况上报,你须静待消息继续潜伏,不可暴露身份,以利双方工作之进行顺利,对个人安全也有保障。时隔一个月后,吴天放团长汇寄200元交陈秋澄转给吴鹏作为津薪费用。吴鹏接款后遂离开我们迁居于林淑宗楼下,因林是厦门巨商,其花园的工头是吴鹏的同乡,在行动上也不比以前小心谨慎。及至同年9月某日,因天气炎热,吴鹏即与厦门商报编辑(已停业)傅贵中邀我同往鼓浪屿大德记后海滩洗浴,游泳完毕在归途中,吴鹏即被厦门警察局侦探缉拿送往工部局,后引渡厦门囚禁于警察局,三天后又解送漳州蒋鼎文绥靖公署讯办。后未知押往何处。

陈庆云口述 朱长江记录整理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

政协同安县委供稿

有关徐名鸿被害的一些情况

杨西涯*

1933年十九路军调福建之后,在闽西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由蔡廷锴兼主任委员,徐名鸿为秘书长,实际负全部责任。当时“闽西善后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人口、土地,实行“计口授田”,同时组织群众(如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作为壮大力量的基础。1933年冬“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十九路军的武装部队由福州退到泉州一带。当时漳厦警备司令兼厦门市长黄强,受了蒋的收买,蒋军进攻厦门时,黄强便投降迎敌。因为厦门失陷,对漳州的影响很大。在漳州的部队,仅有周力行(士弟)一团和一个炮兵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留守部队,当时闽南方面的诏安、云霄等县又相继为与蒋相勾结的土匪及地主武装占领,漳浦县城亦受到蒋的爪牙胡捷部的围攻,后经周团派一营兵力出击,并将胡捷击毙,该部始狼狈由漳浦的旧镇向云霄方面逃走。解了漳浦之围后,漳浦县长陈祖康跑到漳州而不敢回去,徐名鸿当时要陈回漳浦去,并说:“擅离职守的要杀头。”陈祖康不敢作声。因为局势变化得很快,前方的军事情况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逆转。当时留在漳州的部队和人员,也决定撤退到闽西去。有一天徐名鸿对我说:“有一部分人由福州退到漳州来了,现在决定让他们先到龙岩去,他们出发后,我们再一同出发”。我和徐名鸿是最后由漳州出发到龙岩去的。

徐名鸿和我二人由漳州坐一辆小汽车出发,不料过了南靖以后,有一座公路木桥被蒋方烧毁了,汽车不能通过,徐名鸿叫我和

* 作者当时为徐名鸿的部下。